

“城与陵：考古新发现及礼仪观念演进”学术研究的新进展

——兼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2025年12月19日，中国考古学会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会议在郑州大学召开，讨论了未来5年内专委会应开展的相关工作。20日召开了“城与陵：考古新发现及礼仪观念演进”的学术报告会，主要是结合新的考古发现来探讨古代陵墓的演进和发展规律，相关专家做了精彩的点评。

考古新发现及丧葬礼仪观念的演进

12场学术报告凸显了新材料、新视野和新认识。第一，是新材料的发现。吴伟华主持发掘的叶县余庄龙山墓地展示了中原地区礼制文化在龙山中期已有较为清晰的体现，预示了古国时期“王墓”产生的雏形和地域埋葬礼仪的流变；文帝霸陵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曹龙和张丹青分别讲述了霸陵陪葬墓和以陶甗为代表的帝陵构建工程进程，对认识文帝霸陵的建制和动态修建过程提供重要依据；宋贵华报告了湖北荆门淝江王墓的最新进展，展示了西汉早期诸侯王墓的区域特征，为探索西汉诸侯王墓的差异化葬制提供了新资料；徐州小孤山汉墓是徐州发掘的第9座楚王墓，谢威详细讲述了横穴崖洞式的墓葬形制、第宅化的墓室空间布局等关键信息，进一步丰富了西汉楚王墓“若都邑”的序列文化内涵。

第二，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进步，着眼于跨国别、跨区域、跨文化的视野，陵墓考古的发掘研究实现了新目标。周立刚在蒙古国开展了数年的考古工作，通过对匈奴贵族墓葬的研究系统整理，更为全面地把握匈奴贵族阶层葬制的核心内涵；马小飞主持发掘的蔚县代王城与李家庄古墓群墓葬，极大地丰富了战国时期北方地区葬制文化面貌，对深入研究北方地区华夏化进程，以及燕、赵、代的互动交流和族属关系提供重要资料；孙伟刚目前从西周晚期的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开始，纵向梳理出秦族、秦国从附庸到方国、王国、帝国的葬制变迁过程。

第三，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接续开展帝王陵墓的考古工作，进而得出新的认识。韩立森长期从事河北汉代诸侯王墓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对河北西汉诸侯王常山、真定国葬制的全面梳理，让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该地区诸侯王墓的

面貌与内涵；田有前结合唐祖陵的新发现，探索唐代追尊陵的布局内涵和建制过程、对其后的影响；孙凯通过近年的调查勘探，解决了北宋皇陵极为关键的献殿和下宫的布局问题；赵佳罗报告了绍兴宋六陵的考古工作成绩，对于探索南宋皇陵的陵位次序和分布内涵提供新资料。

关于陵墓研究的几点看法

中国的土葬习俗持续了一万多年，未曾中断。历代先民在慎终追远理念的引导下，在阴阳两个世界不断探索生死的意义。统筹考虑居址和埋葬的关系、生者与死者的礼仪关联、生死观的辩证理解实属必要。

第一，处理好墓与居、陵与城的关系。从古代陵寝的发展历程看，先秦时期以居葬合一的形式为主，或者附属于居址附近。春秋晚期以后居葬分离，这与生死观念的演化有密切关系。秦汉以后，都城与陵墓的关系更为重要，涉及国家礼制、风水堪舆等诸多问题，基本脉络是家族血缘关系再现到社会礼制文化规范运用，再到国家政权统治认同三大主题。

第二，把握好丧、葬、祭的流程与考古发现的关系。实际上很多所谓的“随葬品”都是在殡（丧）礼和下葬环节中产生的，比如饭食、小斂、大斂所配置的物品，送葬活动中与“柩车”关联的送葬用品等。特别是洞室墓出现后的墓内祭祀行为以及筑墓过程中遗留下的遗迹和遗物，虽然都属于随葬的范围，今后研究中却要注意进行区分。

第三，帝陵研究要把握好“事死如生事、事亡如事存”的关系。“事死如生事”主要体现的是陵墓在地下埋藏的部分，核心是满足亡者在另一世界的需求；“事亡如事存”更多表达的是对亡者的敬意，对应的是考古发现的地面祭祀、奉祀的设施，是属于当时生者与死者沟通联系的活动内容。这一点，牵扯到了生死两个领域的衔接以及礼制再造和政治目的需求，也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今后古代陵寝研究的重点和工作方向

由于陵墓的考古发现众多，不少成果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毫无疑问是我们开展陵墓研究的重要对象。除此之外，研究要更系统、更全面、更科学和更活化。

第一，平衡好一般性与典型性陵墓的研究。陵墓研究要关注各王朝的典型模式，如西汉阳陵、唐乾陵、宋永定陵、曹魏高陵、明孝陵等，结合文献资料探索王朝更替出现陵寝变制的核心动因以及历史大背景转换的影响。

第二，处理好历史长时段与王朝阶段性陵墓研究。注重长时段观察帝陵制度的演变轨迹，把握好陵墓制度转变的关键节点，如秦始皇陵、汉光武帝原陵、隋文帝陵、曹操高陵、明孝陵等，结合文献资料探索王朝更替出现陵寝变制的核心动因以及历史大背景转换的影响。

第三，把握好陵墓象征性和精神性两系价值研究。清代朱孔阳从文献角度对历代帝陵进行了著述，其中涉及大量传说时代的“帝王陵”，如黄帝陵、炎帝陵、大禹陵乃至宋代的“刘秀坟”等，这些更多的是中华民族血脉、文脉的精神象征，是后世王朝对前代先祖的追忆和缅怀，当然也保留了一些诸如碑刻、祭坛等物质性遗存，需要关注其作为“陵墓”的溢出价值。

第四，统筹好陵墓遗存阐释与遗产保护利用的活化研究。这是陵墓考古的终端目标，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更好地活化利用陵墓遗存，多学科的介入和交叉研究已成为必然的选择，也是我们推进陵墓考古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陵墓考古专委会未来五年的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主要包括学术交流、咨询培训、培养人才、公共传播、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核心是要搭建起陵墓考古工作的交流平台，更好地为陵墓考古、内涵阐释和保护利用工作提供助力，为建设以陵墓为主题的国考古遗址公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构筑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国考古学会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理教授，后于1961年加入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

在芝加哥的四年，对宾福德而言是意义非凡的。在这里他发表了著名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预告了“新考古学”的到来。彼时宾福德身边聚集了一批对当时主流的考古学范式心存不满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和尝试各种研究途径，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集体向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并将成果集结出版。该团体被称为“芝加哥帮”，很多“帮派成员”日后都成为新考古学派的中坚力量。

在此，我们再次观察到柴尔德和宾福德性格上的迥异。宾福德无疑是一位“克里斯玛”式的人物，虽不擅写作，却拥有引人入胜的演讲风格，对同样质疑传统的学生和普通听众无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相较之下，尽管柴尔德从小在文法学院接受教育，精通多门古典和现代语言，但不具备出色的演讲才能，他继承了父亲口齿不清的缺陷。对学生而言，柴尔德没有宾福德身上那种“赛亚式”的魅力，好在他们广博的知识弥补了这一点。

与考古学权威们之间的摩擦，在芝加哥大学持续上演。宾福德坦承与罗伯特·亚当斯和罗伯特·布莱德伍德合不来。与专注于“新大陆”考古研究的宾福德不同，布莱德伍德主要从事近东考古学，后者与柴尔德共享“旧大陆”考古学的某些传统。宾福德曾坦言自己对旧大陆考古怀有学术兴趣，但这一领域在美国历来是富裕阶层的专属领地，需要私人财富的支持，显然宾福德不属于这一阶层。劳伦斯·斯特劳斯在书评中指出，宾福德与布莱德伍德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与前者对既有学术精英阶层的普遍厌恶有关。同样，布莱德伍德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宾福德，并亲手扼杀了后者在芝加哥的职业生涯。

布莱德伍德在当代已经取得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永久教职，资历深厚，拥有对其他考古学家“生杀予夺”的特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初正是布莱德伍德邀请宾福德去的芝加哥，后来，或出于与宾福德观点不同，或出于无法忍受宾福德尖锐性格的缘故，布莱德伍德对宾福德做出了“能力不足”的评价，致使宾福德没能留在芝加哥。

好在此时的宾福德已经顺利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他与格里芬的争端最后以格里芬答应退出答辩委员会告终。1965年离开芝加哥后，宾福德先是在西海岸度过了又一个四年，最终在美国南方找到了适合他学术生长的土壤。

宾福德刚烈的性格在与格里芬、布莱德伍德的交往中已初现端倪，在日后与同行的辩论中，他也保持了这种锋芒毕露的特质，甚至被指控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的程度。反观柴尔德，他对传统和权威的反抗采取了更为迂回和戏谑的方式。哪怕当年因个人政治立场受悉尼大学理事会排挤时，柴尔德也仅仅是写了一封暗藏机锋的信作为回应。

在柴尔德和宾福德身上能够找到一系列对比性的标签：柴尔德反战，在“一战”期间参与反征兵运动；宾福德曾在“二战”后的冲绳为美国军队服务，后受《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资助完成了学业。柴尔德擅长欧洲史前史研究，以综合材料见长；宾福德关心狩猎采集社会，提倡以演绎代替归纳的方法。在个人气质上，柴尔德是属于城市的，是纤细精致的；宾福德更像是他所研究的狩猎采集者，给人粗犷之感。他们一个属于旧大陆，一个属于新世界，犹如考古界的“绅士与牛仔”，若将他们的经历搬上银幕，其精彩程度定不会亚于印第安纳·琼斯的奇幻人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6年1月11日，新时代考古学教材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会暨“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出版座谈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指导，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山东大学历史学院与考古学院党委书记刘军主持会议开幕式，山东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曹现强和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孙莉共同为系列教材揭幕，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院长王芬主持大会主旨发言。来自全国教育、考古文博、文化、出版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考古学教材建设、人才培养及学科发展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建言献策。

系列教材的基本构成和指导思想

作为我国首套完整的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的体系设计与编写理念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教材的整体架构和指导思想足见学科积淀，又回应时代需求，为考古学教材体系建设树立了新标杆。

该系列教材共计13册，构建了覆盖考古学核心领域的完整知识体系。其中断代考古8册，内容贯穿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的历史脉络，系统梳理各时期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科技考古3册，包括《人类骨骼考古》《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聚焦科技手段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与创新；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2册，即《文物保护科学与实践》和《文化遗产概论》，强化考古成果保护与传承的实践导向。教材定位清晰，既适用于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教学，也可作为跨专业硕士研究生生的补修教材，同时为在职文物考古业务人员提供了提升业务水平的优质参考资料。

教材的编写工作于2022年9月正式启动，经过团队的潜心编写和出版团队的通力协作，第一批次7册已于202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分别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夏商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人类骨骼考古》和《文物保护科学与实践》，其余6册将陆续推出。

在指导思想上，教材始终坚持以百年來我国考古学发展及其成就的总结和展示为主线。教材主编代表，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在发言中表示，编写工作始终注重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规范性的统一，既关注国际考古学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更注重提炼中国考古学人在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上的本土贡献；特别强调用中国学人的历史观、价值观和话语系统进行中国考古学的叙事，探索和尝试构建新文科背景下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考古学教材体系，为中国考古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考古打开重要窗口。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常务副院长郎剑锋作为作者代表发言，他表示，教材在内容编排上注重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结合，如《夏商考古》专设“夏商考古与中华文明”一章，通过比较研究凸显夏商时期中华文明的丰富面貌，突出特性及其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既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也为中国考古学“走出去”奠定知识基础。回顾编写历程，方辉教授感慨，教材的顺利出版离不开学校学院的大力支持，出版单位的重点保障以及编写团队同仁在教学和科研压力下的精诚协作，这些合力为教材出版按下了“加速键”。

教材在考古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

新时代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与会领导和专家普遍认为，优质教材是人才培养的基石。“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的出版，为破解考古人才培养难点、构建科学培养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其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体现在多个维度。

完善学科知识体系，夯实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高校中心主任潘信林指出，考古学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是构建系统完整的知识框架，这套系列教材作为体系化成果和案例性资源，恰好填补了这一需求。他认为，教材全面覆盖断代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三大核心板块，既包含基础理论知识，又融入最新研究成果，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为后续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筑牢根基。

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教育处处长党志刚表示，随着中国考古学科繁荣发展，现有教材已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这套兼具系统性、前沿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优质教材，为高校考古专业教学提供了标准化、高质量的核心资源，能够有效解决以往教学中知识碎片化、内容滞后等问题，为人才培养提供坚实保障。

强化实践能力培养，契合行业发展需求曹现强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表示，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才培养必须兼顾学术素养与实践能力。山东大学深耕考古学科建设多年，构建起以田野考古为根基，聚落考古为引领、科技考古为支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体系，这套教材正是这一体系的重要成果，其编写过程始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量融入田野考古案例和科技考古实操方法，能够引导学生将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佟薇认为，教材的实践性特色与行业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她表示，当前考古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教材涵盖文物保护实践、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等实用内容，不仅能满足高校教学需求，还可作为文博单位业务人员的培训教材，助力考古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和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塑造家国情怀，引领价值追求与会代表认为，考古人才培养不仅是知识传授和能力提

升，更要注重价值引领和情怀塑造。曹现强表示，教材通过系统呈现我国百年考古成就，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脉络，能够帮助学生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优秀考古人才。

山东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波表示，考古工作承载着揭示中华文明瑰宝、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这套教材不仅是知识读本，更是文化载体。他认为，教材中蕴含的中国学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和历史观，激励他们投身考古事业，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贡献力量。

对系列教材的评价与各方期待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及出版单位代表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给予高度评价，并围绕教材的使用推广、修订完善及后续发展提出了殷切期待。

对教材的高度评价在评价教材的学术价值和行业意义时，孙波表示，作为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考古学教材建设进入了系统化、集成化阶段，为全国考古学及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核心读本”。

孙莉认为，教材既填补了学科体系空白，又贯彻新文科理念，融入学科交叉与创新思维，推动文科教育的内涵发展。她介绍，科学出版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考古专业类图书的出版社，累计出版近3000种考古图书，这套教材无疑是其中的标杆性成果，其系统性和前沿性将对考古学研究和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潘信林将教材定位为“典范性探索”。他认为，教材扎根中国考古实践，从中国学者的历史观、价值观与话语体系进行叙事，是探索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教材体系的一次成功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系列教材主编之一、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白云翔分享了一个细节：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考古论坛上，多位外国考古同行都主动询问这套教材的出版进展情况。他表示，这一现象充分说明教材不仅服务于中国新时代考古人才培养，更成为世界了解中国考古的重要窗口，其国际影响力已初步显现。

各方的期待与建议在肯定教材已有成就的同时，与会代表也对教材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具体期待和建议。

潘信林提出“四个加强”的建议：一是加快建设，推进其余6册教材的编写出版，将教材整体作为深化考古学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二是加深研究，结合教学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提升教材质量；四是加大激励，鼓励更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教材的推广和使用。

佟薇从长效发展角度提出建议，她希望编写团队持续跟踪考古学科的新发展、新动态，建立教材常态化修订完善机制，确保教材内容始终保持前沿性；同时呼吁广大考古科研机构、文博单位积极推广使用这套优质教材，将其纳入业务人员的培训体系；并建议高校、科研机构、文博单位进一步加强合作联动，围绕教材使用、教学改革、科研创新等方面开展深度交流。

孙波期待以此次系列教材出版和研讨座谈会为契机，共同筑牢考古人才培养的基石、共同推动考古成果的活化利用、共同营造关注考古和支持考古的社会氛围，深化厅校合作、政学协同，共同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文化篇章。

方辉回应，编写团队将认真吸纳各方建议，在后续教材编写和修订中不断完善内容，提升质量，努力打造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精品教材，不辜负业界的信任与期待。

全力推进后续教材的编写出版

会议期间，白云翔主持召开了由作者和编者共同参加的编写出版工作会议，重点研究推进其余6册教材的编写出版事宜。与会作者和编者围绕待出版6册教材的编写进度、体例规范、质量把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明确了下一步编写出版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作者和编者代表表示，将严格遵循教材的指导思想和编写原则，延续第一批次教材的优质标准，注重内容的准确性、前沿性和实用性，充分吸纳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将加强团队协作，严把质量关，细化编写和编辑流程，确保每一个章节、每一处表述都严谨规范；全力推进其余6册教材的高质量出版，尽快形成完整的教材体系，为新时代考古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提供全面支撑。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柴尔德与宾福德——考古学家的双重镜像

——兼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考古学家可能是最受流行文化青睐的知识分子形象，相较于其他领域的学者，考古学家穿梭在书斋和田野之间，总是被奇闻逸事所环绕。影史上经典的考古学家形象来自美国系列电影《夺宝奇兵》。考古、寻宝、世界政治，足了观众的胃口，在虚构的考古叙事中成功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兼冒险家的形象。然而，真实的考古学家又是怎么样的呢？

谁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和路易斯·宾福德无疑是最有资格的两位候选人。事实上，从研究的领域到成长的文化氛围，柴尔德和宾福德的不同是全方位的，谁更胜一筹也只是见仁见智。

无论是致力于严肃研究的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有程度不同的窥探欲，当作品本身已经被反复咀嚼后，我们开始渴望触摸思想体系背后的生命经验。或许只有在潜入某人的私人生活后，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完整的灵魂。

柴尔德应该是被研究最多的考古学家之一，仅传记就有五本。他的父母都来自英国的名门望族，“childe”在中古英语中即有年轻贵族男子的意思，倒是与柴尔德本人的气质颇相符。有一张柴尔德的照片，他在里面手捧一只学生送的泰迪熊玩偶，嘴上叼着饼干，穿着标准的三件套西装，站在一辆凯迪拉克汽车前。照片中的柴尔德使人联想起英国迷你剧《故园风雨后》中的塞巴斯蒂安。剧中的塞巴斯蒂安和柴尔德一样，怀抱毛绒玩具熊，同为贵族之后，并且都曾在牛津求学，他们的性格中都有孩子气的一面。

彼时的牛津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学生团体，柴尔德入学不久就加入了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正是在这段时间柴尔德广泛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

在有关柴尔德私生活的描述中，找不到一位与他有亲密关系的异性，柴尔德从未公开爱恋过，终身未婚，没有后代。

P.T.戴维斯是柴尔德在牛津大学女王学院的好友，前者也是费边社的成员。女王学院当时的副学监阿姆斯特朗曾写信向“军情五处”报告有关柴尔德的情况。柴尔德因共产主义的政治倾向，一直到死前都遭到英国“军情五处”持续且严密的监视），明确提出他对P.T.戴维斯怀有一种“浪漫情愫”，直言柴尔德是受后者的影响才转向反战立场。特里·欧文则将阿姆斯特朗口中的“浪漫情愫”解读为革命友谊，认为P.T.戴维斯的确对柴尔德具有吸引力，但更多是出于彼此志趣相投。阿姆斯特朗对柴尔德的评价并非一个教育工作者对其学生应有的态度，在同一封信中，他还称柴尔德“可能是世界上最丑的人”，鉴于于此，他对柴尔德性取向的揣测有可能是出于恶意。

柴尔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激进的政治立场，他本人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17年8月从牛津毕业后，柴尔德返回出生地澳大利亚，由于持有非正统的政治观点，他在教育界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致使他转而投身政界。柴尔德短暂的政治生涯因其雇主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约翰·斯托里的骤然离世而宣告终结，保守党上台，柴尔德在伦敦的职位被撤销，这一意外事件却成了柴尔德重回学术界的契机。

1922年，被澳大利亚政府解雇后，柴尔德选择留在伦敦，然而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柴尔德一直

柴尔德与宾福德——考古学家的双重镜像

——兼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没有寻得一个正式职位。柴尔德本想继续留在政界，无奈接连碰壁。彼时大学里的考古学教职又极其稀缺，在接连被多所大学拒绝后，他终于在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学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这一高薪工作缓解了柴尔德在经济上的窘境，更重要的是，柴尔德出色的表现为他在英国考古学界赢得了声誉。在两年后的1927年，柴尔德获得爱丁堡大学阿伯克龙比考古学教授一职，前往苏格兰就任。这一年柴尔德三十五岁。

1923年11月，还处在失业状态的柴尔德曾写信给他在牛津时的导师约翰·迈尔斯，称自己需要一个职位头衔，以表明他属于“统治阶层的一员”。柴尔德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要剃削准，而是希望找到一份“有趣的、创造性的、高薪的工作”。在学术和革命间，柴尔德最终选择了前者。爱丁堡大学的教职极大改善了柴尔德的收入水平，借此摆脱了之前在伦敦时近乎赤贫的状态，并充分享受物质带来的美好体验。

在爱丁堡的十九年里，柴尔德个人取得了极大的学术成就，然而就学科建设而言，柴尔德的工作并不那么成功，他从未在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派方面下过什么功夫，但这不代表他对学生不上心，相反，柴尔德对自己的学生非常之好。只是在做学问上，柴尔德更倾向于孤独探索。1946年，柴尔德重新回到英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伦敦，在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十年。

与柴尔德相比，宾福德的影响力的基本没有超出学术界，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宾福德从未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与政府的关系也不似柴尔德那般紧张，宾福德所面临的冲突主要来自美国考古学“当权派”的范式之争。

宾福德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他的母亲虽然来自上流社会，但是在宾福德出生时家族已经衰落。由于家境拮据，宾福德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尝试各种工作，以补贴家用。高中毕业后，宾福德凭借借体育奖学金进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习野生动物生物学。但他放弃了奖学金，因为打橄榄球会占用他大量的学习时间，这一决定无疑使宾福德的经济状况更加糟糕了。1952年，尚未毕业的宾福德应征入伍，被派往冲绳。根据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政府将资助退役军人接受教育，宾福德很可能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参军的。在冲绳，宾福德充当人类学家的日语翻译，也正是在此期间，宾福德接触了人类学和考古学。

1954年退役后，宾福德进入北卡罗来纳大学，他没有继续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时的专业，而是选择了考古学。为了弥补退伍津贴的不足，宾福德重拾他在高中时的老本行，当起了建筑承包商。在伦敦的最初几年，柴尔德也曾为经济所窘，但糟糕的视力和体格显然不允许他从事体力劳动，他主要靠出卖脑力糊口：给英国自由党议员当兼职秘书、翻译书籍、兼职教课和开零星的讲座。

以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宾福德去了密歇根大学深造。在密歇根，宾福德与其导师之一吉米·格里芬在学术观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格里芬的阻挠，宾福德虽已完成论文，却迟迟未被授予学位。在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宾福德在密歇根大学当了一年的助

新时代考古学教材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会暨『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出版座谈会综述

付龙騰